



卡特在就职典礼上，1977年

卡特：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牺牲品

上世纪70年代，在“石油武器”这一概念提出二十多年之后，石油开始真正变成可以制衡世界的力量。

1971年，美国宣布其石油富余生产能力告罄，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大国的“战时安全储备”不复存在。两年之后，1973年4月，取消进口配额制的美国有如饥饿的巨兽，一头杀入世界石油市场，原油日进口量由1970年的320万桶飙升到当年的620万桶。世界的秩序由此被改写，中东不再是从前那个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小者，它有了可以抗衡美国霸权的武器，有了反过来影响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能力。

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利用减产、提价、禁运等手段，联手打击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国，并最终引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1973年—1975年）。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工厂停工，航班减少，对所有石油产品实行配给。国防部的石油供应几乎减少了一半，欧洲的驻军和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不得不动用战时石油储备。

1953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前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伊·亨德森曾预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中东国家恐怕不可避免地会走到一起，制定统一政策。而这些政策将会给石油公司的经营带来灾难性后果。西方对中东石油持续、不断的依赖，总有一天会使欧洲消费者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而上世纪70年代由石油引起的巨大经济危机，似乎证实了这一预言。

卡特是个不太走运的人，迄今被公认的三次石油危机，他应该算赶上了两次。1977年出任美国总统时，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10月—1975年春）刚结束，余波仍在，一上台便面临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难题；谋求连任时，又赶上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初—1980年）。最终，连任梦碎，成了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牺牲品。

恐慌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1978年12月，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十年来美国努力扶持的中东“两根支柱”中的一根倒掉了（另一根是沙特阿拉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发生动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石油市场发生抢购狂潮，油价飙升。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又把抢购狂潮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油价创下每桶41美元的纪录，并最终酿成第二次石油危机，这是当时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为糟糕的是，1979年3月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使得西方国家“核能将成为应付1973年石油危机的一项主要措施”的设想受到威胁，对能源的悲观情绪进一步弥漫。

事实是，伊朗爆发革命之后3个

月便恢复了生产,同时沙特也在增产,石油的缺口没有那么不可救药。但还未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的人们,却被恐慌遮蔽了理性。抢购开始了。

公司开始囤积,采购量远远超出真正的消费量。政府也加入了,对于政府而言,保证国内选民的石油供应已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它们或是通过各大公司进行交易,或是直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易。不知所措的个人也加入了,在美国各加油站外,又出现了等待加油的长长车队。

恐慌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

内阁集体辞职

置身这巨大的非理性潮流之中,卡特似乎有点无能为力。1979年4月5日,卡特提出了一项能源计划,建议分阶段取消对石油价格的管制,同时向石油公司征收57%的超额利润暴利税(此时,随着油价不断攀升,石油公司的利润大幅增加),用以发展新能源、补助公共交通和帮助低收入家庭。

卡特的这一政策两面不讨好:建议放开石油价格,惹恼了自由派人士,他们早就对石油公司的高额利润看不顺眼,担心放开价格之后油价还会继续攀升;对石油公司的“额外”收入征收“暴利税”,激怒了保守派,他们将抢购风潮归罪于政府的随意干涉、竭力控制以及过分严格的规章。

结果,这一计划由于国会拒绝批准而搁浅。

三个月后的7月16日,卡特发表讲话重申他的能源计划,强调开发新能源的巨额资金“必须全部来自对石油工业征收的暴利税”,“要求石油工业给予合作,如果它们不情愿,我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我拥有的权力。”

卡特发表这一强硬讲话的第二

天,白宫宣布内阁全体成员向总统集体辞职,第一夫人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向第一夫人集体辞职。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集体辞职中,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发表了一篇离职演说。演说以丘吉尔的《世界危机》为题,在该书中丘吉尔曾描述他冒着过分依赖伊朗的危险将英国海军从用煤转为用石油的努力。

“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危机的规模比丘吉尔半个世纪前所描述的要大得多,石油问题使这一危机加重了。”“减轻这一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任何重大的突发事件——如由于政治决策、政局不稳、恐怖分子行动或重大的技术事故引起的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严重混乱……能源的前景黯淡,而且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变得更加黯淡。”

在卡特的不懈努力之下,一年之后的1980年3月,众、参两院终于通过了修正过的石油暴利税计划,法案规定:向石油公司征收50%的石油暴利税,用于解决能源开发的经费。随后,国会通过了发展合成燃料法案。此外,卡特又敦促修建了地下战略储备石油基地,并调整对中东的政策,寻找新的进口能源国。

被愤怒包围

卡特的能源政策虽不能应急,也难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但却为80年代美国能源危机的缓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卡特栽下了树,享受荫凉的人却不是他,而变成了里根。因为到1980年夏天时,对卡特的愤怒情绪已经笼罩了美国,这预示着,他离开政坛的日子不远了。

据全美汽车协会调查,1980年6月23日(星期六)这天,全美58%的加油站未营业,周日这一数字则升至70%。运输卡车主早在三周前就

开始了猛烈的全国罢工,上百辆卡车在长岛的高速公路上蜿蜒30英里,使高峰期的交通更加拥挤,激怒了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这一天,卡特赴东京同其他西方大国的首脑就经济问题进行会晤。会上怒气冲天,卡特再次成为被攻击对象。卡特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充满了抱怨和不满。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我横加谩骂,指责美国插手中东有关签署一项和平条约的事是引起全球石油危机的根源。”

还是这一天,白宫国内政策首席顾问斯图亚特·艾森斯塔特上班路上去加油。等了45分钟后,他发觉自己也像全国各地的人一样,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怒气所支配。而这些怒气不仅仅是冲着加油站工作人员和石油公司的,也是冲着政府的。事后艾森斯塔特回忆说:“那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期,通货膨胀,能源危机,所有问题都搅在一起,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想弄清楚这些问题也不可能。”

于是,在东京会晤闭幕的当天,艾森斯塔特给总统发去了一份悲观的备忘录,“再没有其他事情更使美国人民感到灰心、困惑和气愤的了。或者说,他们的悲愤是冲着您个人来的,从诸多方面来说,这似乎是一段最为艰难的岁月。”

当卡特返回国内时,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已跌落到25%,只相当于尼克松辞职前夕。

解救“人质”意外失败

1979年1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德黑兰人质事件”。当天,一大群伊朗年轻人冲入美国驻伊朗使馆,扣押了几十名使馆工作人员。除了对美国由来已久的不满之外,此次人质事件主要针对美国收留刚刚在伊朗革命中下台的前国王巴列维一事。

1979年初，疾病缠身的巴列维离开伊朗之后，先后去过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墨西哥等地，但没人肯收留他。卡特最初坚决反对巴列维来美国就医，但架不住基辛格等人的活动和争吵，最终同意接纳国王。1979年10月23日，巴列维抵达纽约，用假名住进了医院。

虽然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奄奄一息的国王及其随从马上抱歉地离开了美国，但人质危机却并未因此结束，而是持续了444天之久，将近一年零三个月。

1980年4月，人质危机已陷入僵局，卡特决定进行军事营救。8架直升机被派往伊朗的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地点。它们要在夜幕中与6架C-130运输机会合，然后接上运输机上的突击队员，飞往德黑兰，占领美国大使馆，解救人质。

可惜出师不利，一架直升机由于导航问题，另一架则因机械故障双双掉队。接着，沙暴来袭，一架直升机与一架运输机相撞，数名美军丧生于熊熊大火。

卡特直接命令中止行动。营救失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伊朗人毫不迟疑地把人质转移到德黑兰各处，以防美国再次派兵营救。

营救人质失败了，卡特本人也被人质危机所“劫持”。卡特的未能连任，与此次行动中给选民留下的无能的形象有很大关系。

最终，卡特的继任者里根私下对伊妥协，用一大批军事装备换回了美国人质，这便是后来让里根蒙羞的“伊朗门事件”。

卡特主义

第二次石油危机时，西方国家一些人已开始担心，处于危机之中的不只是石油的价格，也不只是经济增长

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可能会是国际秩序和整个人类社会。

不幸而言中。有了70年代“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在卡特执政后期，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掉头，一改“尼克松主义”以来所推行的避免卷入局部的地区性冲突的态度，由战略收缩转而改走战略进攻路线。

1979年2月伊朗革命后，美国开始着手加强布署在海湾及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力量。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一项对海湾地区的政策声明，宣称“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在这份咨文中，卡特警告苏联不要利用伊朗和阿富汗的动乱作为借口，谋求实现苏联长期以来获得一个不冻港的目标。这便是著名的“卡特主义”。

卡特的连任之梦虽然破碎，“卡特主义”却影响深远。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就在“卡特主义”的基础上，在中东进一步全面加强了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变得更加倚重以色列，注重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实行军事干涉，同时继续推进中东和谈。

1991年1月爆发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卡特主义”的延伸。

促成签署戴维营协议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一直是美苏两国角力的竞技场，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美苏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谁主导了中东，谁就能控制这世界上的大部分石油和命运攸关的石油通道，最终也将左右西方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无论是美苏双方，还是中东各国，都意识到了和平的重要性——战争只会增加石油的不安全性。只有和平与稳定，才能使西方国家保有稳定的石油来源，才能使西方各国和中东各国的经济得到健康发展。认识到这一点，美国 and 苏联两个大国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美苏不可避免地仍在争夺话语权，于是，军事竞赛便转化为和平竞赛了。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离开苏联倒向美国，使得美国在阿以争端中作为仲裁人的地位得到加强。1978年9月6日—17日，卡特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一起，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了为期12天的会谈。会谈后，埃以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史称“戴维营协议”。

“戴维营协议”在中东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第一份和平协议。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交还了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的西奈半岛，埃及承认了以色列，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卡特的这一创举对美国扼制冷战对手苏联具有历史意义，卡特在回忆录中说：“最令人瞩目的是埃及转而不和苏联结盟，而采取一种中立或者甚至是对美国友好的态度。这一点比较明显，将来对以色列发生任何军事威胁的关键在埃及。只有他们才有进犯以色列的最可怕的力量，而且在以往的战役中他们总是走在前面。他们也是在对以色列历次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将来不管作怎么样的和平解决，埃及是症结所在。”

“戴维营协议”，打开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新格局。

“主导”中东和平进程，也可以说是卡特主义的一个“胜利”。